

【本文发表于国家统计局办《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6期】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中国大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经济关系演变、贸易结构变化三个方面入手，分析三角经济关系的现状与趋势，为下一步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贸易政策提供研究基础和理论平台。

**[关键词]** 中美台 经济关系 贸易结构

## 海峡两岸及与美国之间的经济比较

朱 磊

台海两岸未来的政治走向是中国崛起之路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准确把握中国大陆、美国、台湾（以下简称“中美台”）这个不等边的三角关系，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本文试图从经济比较角度对该地区当前经济形势进行探讨。

### 一、区域经济关系与区域政治关系的理论探讨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内有的学者认为，国家的政治利益是首要因素，经济利益是第二位的。但笔者以为，经济利益在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互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前一种观点明显带有建构主义理论的痕迹，即认为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决定的，而非物质力量<sup>1</sup>。但建构主义在强调理念因素的同时，不否认当理念受到物质力量的持久支撑时将产生更大的影响<sup>2</sup>。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阐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时，也不否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巨大的反作用，这是符合系统论思想的非线性现象，也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首先，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长期来看，区域政治关系必须与区域经济关系相适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充满哲理的精辟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3</sup>。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内部，政治生活等上层建筑的内容是由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我们把“社会”的内涵扩大到全球范围，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总体上要与国际经济关系相适应。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生产力的最重大的进步都是分工的结果，而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市场突破一国范围，社会分工也扩大为国际分工，于是演化成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关系，并决定作为“全球上层建筑”的国际政治关系。这个逻辑可以解释大量国际性机构的出现和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就具体国家和地区而言，由于在区域经济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不一样，其区域政治地位也相应有所不同。当然，区域政治关系也必然会反过来影响甚至决定区域经济关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种互相作用体现的强度不同。

其次，经济利益是决定政治关系走向的关键。经济利益是一国生存发展并实现政治强盛的基础，其它方面的利益均在此基础上产生。正如恩格斯所言：“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sup>4</sup>。尽管不能将区域政治关系简单归结于经济因素，但总的趋向是将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本国经济地位的国家当朋友，将威胁本国经济安全的国家当对手。这种相关关系有时会不明显，是因为在必要时，需要放弃局部的、暂时的经济利益，以

求获得长远的政治和军事安全，最终获取长期经济利益。这个逻辑可以解释经济利益竞争激烈的美日两国为什么可以保持较好的盟友关系。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都认为，在共同利益很小的情况下，国际关系接近零和博弈<sup>5</sup>；因经济联系增强而扩大的共同利益则使国际政治关系更易达成“双赢”。

再次，经济实力决定国际关系地位。经济实力是政治、军事、科技等实力的核心，强大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其它方面实力的提升，相反则会导致其它实力下降。由经济实力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有时会与由政治实力决定的国际政治格局不一致，但总的趋势是相符的。如前苏联在冷战时期是支撑两极对抗格局中的一极，但因经济实力下降，其国际政治地位也随之下降；而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作为配角的日本，因其经济实力强大其国际政治影响也在日渐扩大。

总之，一国或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直接或间接决定着其在区域中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的变化是根本的、长期的、缓慢的，相对而言，政治关系的变化是派生的、短期的、快速的。但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政治关系的变化也可能会反过来决定经济关系的变化，此即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转化<sup>6</sup>。另外，经济关系的密切多数时候是有助于国际关系改善的，但也可能导致经济对抗和经济争霸。经济利益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因此，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核心是要占据有利地位，参与规则制定，从根本上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

## 二、海峡两岸及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对比

经济实力是影响区域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因素。因经济实力相差较大，两岸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呈现为一个不等边三角形。美国经济规模遥遥领先，中国大陆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但与美国仍有相当大差距，台湾紧随大陆之后，但有越来越远的趋势。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看，中美台 2002 年的比例为 4:33:1。中国大陆 GDP 为 12372 亿美元，占世界比重 3%，为美国 GDP 的 12%。美国 GDP 达 104456 亿美元，占世界比重 33%，超过经济规模排名第 2-6 位(日、德、英、法、中)的 GDP 之和。台湾 GDP 为 2797 亿美元，是美国 GDP 的 3%，大陆 GDP 的 23%。但是，近几年来(1995-2001)中美台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4%、3.5%和 4.7%，显示中国大陆与美国间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与台湾的差距在拉大。<sup>7</sup>

从对外贸易量来看，中美台 2002 年的比例为 3:8:1。中国大陆外贸总值 6208 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5%，居世界第 5 位。其中进口与出口分别为 2952 与 3256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为 4%和 5%。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国和进口国，其外贸总值 23823 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值的 15%；其中进口与出口分别为 14209 和 9613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为 17%和 12%。美国无论进口还是出口总值，均超过世界第二和第三大贸易国德、日之和。台湾外贸总值 2431 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2%，为大陆外贸总额的 39%。其中进口与出口分别为 1125 与 1306 亿美元，分别为大陆进出口的 38%和 40%。<sup>8</sup>

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来看，中美台 2002 年比例为 38:22:1。中国大陆是最具吸引力的地区。2002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达 527 亿美元；美国则以 301 亿美元名列世界第 4，吸引外资额度为中国大陆的 57%；台湾则从上年的 41 亿美元下跌至 14 亿美元，为大陆的 3%。<sup>9</sup>

从科技实力来看，中美台科研经费比例大体为 2:44:1。中国大陆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呈现逐年递增的势头，2002 年增加到 1161 亿元人民币(140 亿美元)，占 GDP 的 1.1%。全年受理专利权申请文件的数量由 1997 年的 61382 件增加到 2002 年的 82289 件。2000 年美国研究与开发投资达到 2640 亿美元，占世界研究与开发投资的 45%，相当于其它西方 6 个大国研发投资之和。美国人发表在世界主要学术刊物上的科技论文数量和获得专利权的数

量名列世界第一，全球 35% 的科技论文出自美国人之手，1/3 以上的国际专利由美国人申请。2000 年台湾研究发展经费为 1976 亿元新台币（60 亿美元），占 GDP 的 2%。

从财政实力来看，中美台财政收入 2001 年比例为 4:43:1。2001 年中国大陆财政收入 16386 亿元人民币（1981 亿美元），财政支出 18903 亿元人民币（2286 亿美元）。同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为 19910 亿美元，财政支出为 18639 亿美元。2002 年，台湾财政收入为 16098 亿元新台币（463 亿美元），财政支出为 17141 亿元新台币（493 亿美元），分别为大陆的 23% 和 22%。

从金融实力来看，中美台股市总市值比例大体为 2:45:1。2003 年 10 月，中国大陆境内上市公司达 1278 家，总市值 38523 亿元人民币（4658 亿美元）。2001 年底，美国上市公司为 2798 家，总市值 117140 亿美元。2002 年底，台湾上市公司为 638 家，总市值 90949 亿元新台币（2617 亿美元），约为大陆股市的 56%。比较金融实力当然不能仅看资本市场一个方面，该指标只能做部分参考。

从整体竞争力来看，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评估，自 1992 年到 2003 年，美国一直保持世界竞争力第一的位置。中国大陆在 2002 年和 2003 年均排在第 12 位；台湾则由 2002 年的第 7 位升到 2003 年的第 6 位，这主要是其企业竞争力得分提高所致。<sup>10</sup> 由于该评估报告结构几经变动，且调查问卷中的主观成分较多，所以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从企业竞争力来看，据美国《商业周刊》，2002 年全球最有价值的 20 个品牌美国占 15 个，其中前 5 位全部是美国品牌。据美国《财富》杂志，2001 年美国有 197 家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排行榜，占 39%。上榜企业营业额占 500 强营业额的比重为 42%，利润额比重为 71%。前 10 名中有 6 名是美国企业。中国大陆企业进入 2003 年世界 500 强中的有 9 家，位次最靠前的是第 60 名的国家电力。台湾企业进入 2003 年世界 500 强中的有 2 家，位次最靠前的是第 440 名的国泰人寿。<sup>11</sup>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品牌和规模，上述比较并不全面，事实上两岸的中小企业都有相当强的竞争力。

从产业结构来看，美国在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上都有较大优势，中国大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台湾产业结构则严重偏向高新技术产业。据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资料，1995 年美国高新技术产值占制造业比重为 16%，出口占世界高新技术出口总值的 21%，高于日、德两国之和。在全球 3000 多亿美元信息技术产品贸易中，美国占 1/3 左右，电脑软件及服务占世界市场的 75%。中国大陆高新技术产品占制成品出口比重从 1998 年的 15% 提高到 2002 年的 20%。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值由 1995 年的 101 亿美元增加到 2002 年的 679 亿美元；占总出口比重从 1995 年的 6.8% 增加为 2002 年的 20.9%。2002 年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值为 1,660 亿美元，占整体出口的 24%。台湾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整体出口的比重由 1992 年的 38% 升至 2002 年的 54%。

总之，在中美台三角经济关系中，美国无论在发展水平还是发展潜力方面都拥有绝对的优势，中国大陆短期内无法赶上和超越美国，还不能掌握双边经济关系的主控权。同时也应看到，三方中以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最快，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对台湾优势继续增强，三角经济关系向着有利于中国大陆的方向在发展。

### 三、海峡两岸及与美国相互经济关系的演变

经济关系演变影响众多群体经济利益变化，参与者的切身经济利益直接影响其政治取向，进而左右区域政治关系。中美台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从绝对增长值来看，每一边都在增强；但从相对变化率来看，两岸经济联系增速最快，中美经济联系次之，台美间经济联系的发展潜力相对有限。这种经济关系演变将迫使与之并不协调的政治现状有所改变。

#### （一）中美经济关系

中美经济关系发展迅速，双方依存度不断增加。中美经贸往来由来已久，但经贸关系正常化是在 1979 年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协定之后。自 1980 年 2 月起中美互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此后贸易额迅速增长，2003 年双边贸易额达 1263 亿美元，是 1979 年的 52 倍。自 1972 年起，美国连续 21 年对中国保持顺差，1993 年起中国由逆差转为顺差；1997 年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后，中国顺差额加速扩大，2003 年达 586 亿美元。贸易平衡问题使中美经济关系发生磨擦，但温家宝总理 2003 年 10 月会见美国商务部长时表示，中美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协商求得共赢局面。

双向投资规模都不断扩大。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前美国对华投资规模不大，到 1993 年底投资总额仅为 63 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对外投资 1% 强。其后规模迅速扩大，2002 年美国对华投资项目 3363 个，合同金额 82 亿美元，实际金额 54 亿美元。截止 2003 年 2 月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合同金额与实际金额分别为 37821 个、779 亿美元和 407 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中国对美投资则从无到有，不断扩大。截止 2002 年底，经批准的中国在美投资企业共 703 家，协议金额 11 亿美元，实际金额 8 亿美元。直接投资外，中国购买美国债券急剧增加，到 2003 年 6 月止，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达 1220 亿美元，仅次于日本。<sup>12</sup>

## （二）海峡两岸经济关系

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迅猛，台对陆依存度不断升高。两岸经贸关系至今未能实现正常化，贸易、投资仍未摆脱间接、单向局面。两岸贸易始自 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倡议海峡两岸“三通”。1979 到 1988 年的十年间，两岸经贸联系在中断 30 年之后获得初步发展，经香港转口贸易金额由 0.77 亿美元增加到 27.21 亿美元。1989 到 1997 年是两岸经贸关系起步以来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经香港间接贸易金额由 1989 年的 34.84 亿美元增加到 1997 年的 198 亿美元。此后随大陆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台商对大陆投资迅猛增加，两岸贸易额也急剧扩大，2002 年大陆成为台第一大出口市场，2003 年两岸贸易额达 584 亿美元。由于有一半左右商品被台湾当局禁止从大陆进口，两岸贸易增长还有巨大潜力。

台商到大陆投资虽起步晚，但发展相当迅速。1979 年到 1987 年，台商经第三地秘密投资大陆，合计投资项目仅 80 个，金额约 1 亿美元。1988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台商纷纷以探亲名义赴大陆投资，1988 年到 1991 年合计投资项目 3785 个，金额 33 亿美元。1991 年台湾当局首次以“正面表列”准许部分制造业产品项目到大陆投资，台商赴大陆投资开始异常迅猛地发展。1992 年到 2001 年的十年间，经台当局核准的台商投资大陆金额总计约 197 亿美元，占台核准对外投资总额的 42%。但迄今为止台湾当局仍未开放大陆企业赴台投资。

## （三）台美经济关系

台美经济关系平稳发展，台对美依存度有所下降。台美经济关系发展大体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发生明显变化。在此之前，台美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无论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都处于上升状态，尤其以 80 年代上半期发展最快。从 1952 年到 1989 年，累计双边贸易额 2545 亿美元，台对美顺差 884 亿美元，其中 1979 年到 1989 年发展较快，年均台美进出口总额 220 亿美元，10 年累计顺差 806 亿美元。但 80 年代中后期，双边贸易的绝对值仍在增长，但相对值有所波动。台湾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开始下降，从 1984 年的 38% 持续跌至 1995 年的 22%。此后 5 年台湾对美国出口继续增长，自美国进口有所减少，顺差额继续扩大，贸易依存度基本稳定在 22% 左右。

台美间双向投资大体始于 1979 年后。此前基本是美国对台湾单向投资，1966 年前几乎全部是官方投资，1966 年后美国私人资本进入台湾，但数额不大，至 1978 年累计投资额仅 5 亿美元。80 年代双向投资均增长较快，美国私人资本对台投资达 22 亿美元，台商对美国

的直接投资金额达 9 亿美元。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台湾私人投资大量涌向大陆和东南亚地区，对美国的投资依存度由 1989 年的 55% 骤降至 1994 年的 5%。1995 年后，由于台商对美投资有项目大型化趋势，投资依存度基本稳定在 10% 左右。

#### 四、海峡两岸及与美国贸易结构分析

海峡两岸与美国三者间的经济往来主要通过贸易、投资与金融等渠道进行，其中以贸易往来内容最为广泛，影响也最大，贸易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相互经济关系的变化。

##### （一）产业间贸易结构分析

产业间贸易理论的发展是以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说”为基础的，其核心思想是：如果一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有绝对优势，通过专业化生产并出口绝对优势较大的那种产品，进口绝对优势较小的产品，仍可获得国际贸易利益。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自然禀赋说”对此进行了发展，认为生产成本的差别不一定来源于生产技术差别，更可能是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而要素价格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后来的规模经济理论扩大了比较利益产生的原因范围。对于比较利益的衡量，可采用显示性比较利益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sup>13</sup>进行计算。该指数是一国某种产业总出口量占该种产业全世界总出口量的比率，以此衡量该产业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互补性程度。**结果显示：**从 1990 年到 1999 年，美国出口产业变化不大，主要集中于资源型产业；中国大陆与台湾变化明显，中国大陆由资源型产业及劳力密集型产业向劳力密集型产业集中；台湾则由劳力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重过渡到高度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sup>14</sup>。

中国大陆 1990 年比较利益最高的前 5 项产品为：成衣及服饰品、鞋类制品、纺织制成品、油用种子及果实、动植物原料。具有次强竞争力的产品有 7 项，依次为：活禽畜、家畜饲料、纺织纤维及废纤维、矿物及矿物性肥料粗料、鱼类甲壳类软体类及制品、旅行用品手提袋及类似产品、活体动物包括动物园动物。总的看集中于资源型产业及劳力密集型产业。1999 年原本在前 5 名外的旅行用品手提袋及类似产品变成第 1 名，卫生暖气照明用设备及附属品、煤焦炭及煤制品也进入前 5 名，显示资源型产业竞争力下降，劳力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上升。

美国 1990 年比较利益最高的前 5 项产品为：烟草及制品、油用种子及果实、天然气及炼制煤气、动物油脂、其它运输设备。战争武器则属于具有极强竞争力的类别。显示美国出口具比较利益的产品多集中于资源型产业，除因美国土地广大，很早发展成机械式农耕外，还因为美国研究发展和创新能力居世界之冠，传统成熟型商品多靠进口，本身则专注于研究与行销。1999 年最具比较利益的前 5 项产品基本不变，只有烟草及制品退出。但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与 1990 年相比竞争力有所下降，应是其为追求低成本和高技术更大范围内采用全球运筹产销模式所致。

台湾 1990 年比较利益最高的前 5 项产品为：办公室机械及自动资料处理设备、卫生暖气照明用设备及附属品、旅行用品手提袋及类似产品、鞋类制品、纱布纺织制品及有关产品。1999 年比较利益最高的前 5 项产品为：办公室机械及自动资料处理设备、皮革制品及硝毛皮、纱布纺织制品及有关产品、电力机械仪器器具及零件、金属制品。出口商品结构明显由劳力密集型产品转为资本密集型产品。

##### （二）产业内贸易结构分析

产业内贸易理论又称新国际分工论，用于解释区域贸易何以会在相同的部门间进行。林德尔的“收入偏好相似论”从需求方面解释了区域贸易的流向，认为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对消费品或资本货物的偏好相近，因此进出口的产业也相同。后来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将原因归纳为产品差别、消费者偏好、两国需求的重叠程度、厂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动机，而“规

模经济说”和“不完全竞争说”则成为新国际贸易理论中解释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学说。在衡量产业内贸易程度时，国际上通常用调整后 GL 指数<sup>15</sup>和 Aquino<sup>16</sup>指数进行衡量。计算结果显示：中美产业内贸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且速度很快，中国大陆呈现与美国由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的趋势。台美间产业内贸易也不断增加，也有从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的趋势，但与中国大陆与美国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变化相比，有趋于稳定的走势。两岸间产业内贸易迅速增长，已由垂直分工转变为水平分工。

中美间进出口产业结构向机器及运输设备集中。从 1989 年到 2000 年，中国大陆对美出口的前三大产业一直是杂项制品<sup>17</sup>、机器及运输设备<sup>18</sup>、原料类制品。不同的是，机器及运输设备所占比重大幅上升，由 16.5% 升至 34.9%，显示中国大陆对美出口产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增加，但目前劳力密集型产品仍占出口的一半。中国大陆自美进口方面，1989 年前三大产业是机器及运输设备、食品及动物、化学品。2000 年第二大进口产业被非食用原料取代，而机器及运输设备进口比例由 32.8% 增至 49.6%，显示中国大陆自美进口产品向机器及运输设备集中。

台美间进出口产业结构向机器及运输设备集中。台湾出口美国方面，1989 年前三大产业依次为杂项制品、机器及运输设备、原料类制品，与中国大陆对美出口的前三大产业相同。2000 年台出口美的前三大产业顺序有所改变，依次是机器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原料类制品，其中机器及运输设备的比例由 38.1% 上升至 65%，反映台对美出口产品快速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台自美国进口方面，1989 年前三大产业依次为机器及运输设备、化学品、食品及动物，2000 年排列次序相同，只是机器及运输设备由 41.8% 升至 60.2%，显示台湾自美进口产品向该类产品集中。

两岸间进出口产业结构同样在向机器及运输设备集中。2002 年台湾出口大陆前 10 项产品占对大陆出口总额的 98%，其中电机设备及零件占 35%。产业内贸易比重继续增加，两岸相互出口的前 10 项产品有 5 项重叠。台湾对大陆出口的前 10 大产业中有 8 项属于水平分工，包括电机设备及其零件、塑胶及其制品、钢铁、光学仪器、人造纤维丝、有机化学品、人造纤维棉、漆墨染料等，仅机械用具及其零件、铝及其制品 2 项属于垂直分工。两岸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指数（IIT 指数）由 1992 年的 16 增加至 1998 年的 30，呈迅速增长之势；其中电子产业 IIT 指数由 1992 年的 0.5 增加至 1998 年的 38，产业内贸易水平增速惊人<sup>19</sup>。

总之，区域生产分工的变化体现社会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中美间水平分工的增加、两岸间由垂直分工变为水平分工、以及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都反映了中国大陆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实力在以较高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大陆在三角经济关系中主控力增强。对这种形势的改变，本文倾向理解为贸易条件的改善，而非依附理论中支配关系的变化<sup>20</sup>。

## 五、结论

根本上讲，区域经济关系对区域政治关系有决定性作用。经济关系的变化影响众多群体经济利益变化，参与者的切身经济利益直接影响其政治取向，进而左右区域政治关系。中国大陆在中美台三角经济关系演变中地位日益重要，只有保持这种发展势头，才能有效应对美国新兴起的“帝国野心”<sup>21</sup>，才能在中美台的区域生产分工链中居于关键地位，才能确保以和平手段政治解决台湾问题，进而确立中国在多极世界中的大国地位。为实现该目标，中国应制定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巩固和发展中国大陆在三角经济关系中取得的有利成果。虽然关于对高附加值、高技术外溢的产业制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学术界尚存争议<sup>22</sup>；但多认为日本和韩国的已有实践是成功的。正视中美台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利用已有的贸易互动成果，中国大陆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区域生产分工，在中美台三角经济互动中掌握主动权。趋势上看，中美经贸关系演变将呈现总体积极发展、局部磨擦不断的局面，及水平分工不断

增加，且增速快于台美经贸关系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则已由垂直分工变为水平分工，未来联系会更加密切，并成为改变三角经济关系的最活跃因素。三角经济关系的变化将最终改变与之不相适应的政治关系。

注释：

- <sup>1</sup>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00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页。
- <sup>2</sup> Stephen M.Walt, "Rigor of Rigor Morit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1998, p43.
- <sup>3</sup> 《马列著作选读哲学》，1988年版，人民出版社，293页。
-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版，人民出版社，246页。
- <sup>5</sup> (美) David A. Baldwin 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2001年版，278页。
- <sup>6</sup> 柳剑平，论国际经济关系学的性质及其与邻近学科的关系，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7期。
- <sup>7</sup>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和发展中国家》报告 2003，<http://www.worldbank.org>，等。
- <sup>8</sup> WTO 统计资料，<http://www.wto.org>，等。
- <sup>9</sup>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http://www.un.org>，等。
- <sup>10</sup>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 (IMD) 的《世界竞争力年鉴》<http://www.imd.ch/wcy>。
- <sup>11</sup> 美国《财富》杂志，<http://www.fortune.com>。
- <sup>12</sup> 林珏，美方要求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背景分析，2003，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论文。
- <sup>13</sup> Aaagarwal 和 Pandey 于 1992 年提出。
- <sup>14</sup> 张静贞等，台湾与美国经济互动关系之量化评估，(台) 台湾经济论衡，2003 年第 1 期。
- <sup>15</sup> Grubel 和 Lloyd 于 1975 年提出。
- <sup>16</sup> Aquino 于 1978 年提出。
- <sup>17</sup> 包括：纺织品、鞋帽伞、毛发制品、石料、水泥、陶瓷、玻璃制品、家具、木材制品、玩具、体育及娱乐用品等劳力密集型产品。
- <sup>18</sup> 包括：电子产品、机械、信息与通讯产品、家用电器、运输工具及设备、精密仪器等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
- <sup>19</sup> 张冠华，台商大陆投资对两岸贸易影响探析，台湾研究，2003 年第 4 期，pp53-54。
- <sup>20</sup> 陈玉玺，台湾的依附型发展，(台) 人间出版社，1995 年版，pp15-26。
- <sup>21</sup> G.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p44-60.
- <sup>22</sup> Paul.R.Krugman, Maurice.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fifth edition), pp261-280.